

心理传记学：一种人格的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

——兼评《天命可违：诸葛亮行为决策的心理传记学分析》*

李莉莉^{1,2}

(1. 新疆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7; 2. 新疆心智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心理传记学运用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处理有关个体生命的记述资料,通过对人物生命历程进行重建和解释,提出和解决心理学问题,是一种人格研究的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该方法强调个别和特殊事物的现象学价值,由此凸显了个案研究的意义;强调研究者的意识经验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本质直观和意义理解,以关照完整人格和人的内在世界。从根本上讲,心理传记学属于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天命可违》一书充分体现了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模式,是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的实践案例。除共时性比较和三角互证外,心理传记学的科学性还在于,其是否如实描述了研究对象,是否充分理解了对象的意义,是否能带来广泛的共鸣。

关键词:心理传记学;现象学－解释学分析;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5)04-0316-05

1 引言

心理传记学通过对人物生命历程进行重建和解释,以提出和解决心理学问题。因此,虽然心理传记学既涉及历史学,也兼具文学体裁的样式,但从根本而言,它仍属于心理学范畴。20世纪80年代之前,该领域的研究还比较零散,研究对象也较局限,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案,也未得到心理科学领域的广泛承认。近三、四十年来,随着国内外相关研究增多,心理传记学在社会组织、学术成果和研究平台上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源,人们对心理传记学的关注度也显著提升。一部分对主流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模式不满的心理学者,通过心理传记学获得了研究志趣,并正在推动这一领域成为心理学的重要分支。不过,关于心理传记学这一研究领域尚存一些争议,其中包括:心理传记学的学科定位是什么?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个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何在?等等。因此,探讨心理传记学相关问题,具有学科本体论意义。

从已有研究看,心理传记学在很多方面都与典型的心理学研究相区别。它是一种个体研究,区别于群体研究,亦区别于以样本代表总体的数据标准化研究;它是一种人格研究,区别于以心理机能的普遍规律为对象的共性研究;它是一种以分析文献、史料、作品等间接手段为主的推理研究,区别于直接对人进行观察和实验的经验研究;它是一种质性研究,

区别于定量的统计和实证研究;它是一种整体人格研究,区别于因素分析式的特质研究。心理传记学的这些特征中至少有三个方面与其研究方法有关,也代表了其方法论的意义与价值(Kövüry, 2011)。在研究方法上,心理传记学采用的是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

2 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

现代心理学建立以来,其研究方法一直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以观察、实验、测量、统计等自然科学方法为主的实证主义取向,一种是以体验、理解、解释、本质直观等人文科学方法为主的现象学取向。总体来看,现象学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象学方法反对简化主义,主张回到事物本身。简化主义追求一般性,寻找普适的原理和法则以描述和解释事物,这也意味着一种原理越是简化,其概括的范围越大,越具有一般性,其对事物个性的表达丧失得也越多。而现象学认为,任何一种现象、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只有通过特殊现象进行具体地直观、分析和描述才能洞见一般本质,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使用奥卡姆剃刀削除现象不符合理念的部分。

现象学方法反对因素分析思维方式,强调通过意识机能对事物的整体、形式、性质进行直观。因素分析式研究往往关注构成事物整体的微观结构或对

* 基金项目:新疆心智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重点项目“学习过程的具身性及其教学应用研究”(XJDX2003-2022-01)。

通信作者:李莉莉, E-mail: bluebird555@163.com。

象的某个方面,认为了解部分是认识整体的关键。在对人的意识与人格进行说明时,这种分解会令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失真。洛采(H. Lotze)所言的“计算世界的进程并不意味着理解世界的进程”(转引自倪梁康,2009)正是指出了数量化分析存在的弊端。而作为心理学、人类学之基础的现象学则以意识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为手段,即所谓的本质直观方法,是一种对范畴和形式的非感性直观。支持者们相信人的核心认识能力是内在的理性,感官经验、数学计算、逻辑演绎都是本质直观的手段和材料。

现象学立场中的心理学关照人的内在经验世界,而在实证主义精神影响下,自然科学身份的心理越来越远离人的主观内在世界,并通过外在可观察的表现对人的内在“黑箱”进行推论。这样,实验心理学只是外在地将有机主体置于物理的空间范畴中,使其成为物理因果的一部分。国内现象学者倪梁康认为,精神科学的研究应以动机的理解和诠释为主,而非以物理因果解释和说明为主。今天的心理学还只停留在“粗糙的经验观察学说和实验学说水平”。在原则上,这样的心理学类似于“在精确的、建基于新的数学物理学上的天文学出现之前的观察天文学”(倪梁康,2009)。相反,现象学立场的心理学始终关照人的内在体验和精神世界,强调通过意识的结构和机能以及内在动机来解释外部行为。

作为现象学的一个分支,解释学将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运用于解释理解过程。认为理解活动在根本上是一种凭借内心体验的直观,以把握直接呈现在意识面前的现象(李建国,1995),这些现象可以是自然景观、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资料等有待理解的事物和文本。理解不是人对自己之外的其他对象的冷静观察或沉思,而是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阐述和把握。

与现象学相同的是,解释学也旨在超越近代科学方法论所设置的界限。近代科学将主体和客体看成是两个分立的静态存在,认为知识就是对事物本身事实的把握,而真理就是使主体的认识尽量地与客观现实相符合。解释学则强调理解者和被理解者的相互交融、渗透和依赖。在伽达默尔看来,自然科学的真理观与方法论不能运用于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的经验,这些非科学经验,不能通过科学方法论加以证实并显现自身(蒋平,2011)。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研究志趣、研究属性和研究方法上都是不同的。国内哲学家邓晓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本体性的、而非工具性的体现,它从科学的间接性回复到了直接性,它不是向外扩展而是向内

深入,不是从必然出发而是从自由出发,因而它不具有自然科学的严格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和可规范性,不能通过定量方法而揭示内在程序。自然科学将感性抽象化,人文科学却要求并归结为每个人切身的体验和直观”(邓晓芒,1990)。

通常,心理传记学被界定为对个体整个生命历程的研究,旨在提出能够描述人格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舒尔茨,2005/2011)。其研究强调文本释义的重要性,注重最初的印象和解释,并介入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脉络中,实现对个体生命历程的重新诠释。它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经验互动和交流,虽然这种交流是隔空的,但在阅读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均会发生变化,被研究者的生命意义得以揭示,研究者同时发生和实现了个人成长。由于心理传记学对个体的生命故事和生命体验进行细致的描述和解释,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被视为一种现象学-解释学生命叙事分析(Phenomenological-hermeneutic Life-narrative Analysis, PLA)(Mayer & Köváry, 2019)。这种方法与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郭本禹,崔光辉,2008)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现象学和解释学融合的质性研究方法,都关注人的内在经验。但在细节上,二者又是相区别的。IPA的研究过程体现为一种双重诠释,即研究对象尝试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研究者再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加以理解。通过分析交流过程中的语料,揭示个体内在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Smith & Osborn, 2003, 2015),以深入理解个体是如何建构意义的,尤其是特殊经历、事件及生命状态的意义。因此,IPA的研究对象一般是现世的。有人认为,IPA并不适用于生命叙事研究(Knight, 2019)。相反,PLA关注个体整个生命历程,运用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处理个体生命的记述资料,以研究其人格发展问题,因此适用于所有试图从现象学视角解释人类生活事件和生命经验的生命叙事研究,包括心理传记学。

3 心理传记学中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Knight(2019)总结了心理传记学采用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的九个步骤,对于处理心理传记材料和心理传记学研究过程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指导。这九个步骤分别是:阅读以及反复阅读关于个体的生命叙事;揭示“理解的前结构”以处理研究者自身的偏见;揭示精神传记作家的生活叙事,以理解其无意识研究者偏见;生命叙事中的现象学主题初探;在生活叙事中发展新出现的主题并确定经验的“意义单位”;在生活叙事中寻找突现主题之间的联系;如果使用多个生活叙述(多个案例),需重复上述生活

叙述过程;在其他生活叙事中寻找模式;理论构建。

在《天命可违:诸葛亮行为决策的心理传记学分析》*一书中,作者探讨了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模式,包括“选择传主,提出悬念点;资料的选择和分析;解释理论的选择与发展;考察研究的有效性;心理传记的撰写”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从本质而言都是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的实践应用。

在传主的选择上,该书作者选择了诸葛亮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诸葛亮是一位非凡人物,而且相关资料丰富,在今天看来这些史料也趋于客观化,这是选择传主的标准。其实,诸葛亮不仅仅是一位流传千古的历史人物,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代表了忠义、勤勉、智慧、士族的最高成就和理想。因此,诸葛亮的人格具有文化人格的典型性,典型性是人格个案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也是心理传记学挑选传主的重要标准。在选择传主后应该确立悬念性问题。悬念性问题的提出有赖于对传主生活叙事资料的全方位把握,从中提炼出那些有意义、有价值、令人疑惑的问题。那么,如何判断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且是理解传主的核心关键问题呢?一是这些事件引发的疑问与传主的核心人格特征有关,二是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利于对传主人格形成过程加以考察。初步提出形成传主人格的悬念性问题后,需要对其进行拷问。通过 Knight 所言的“消除无意识偏见”来理解这个悬念性问题是否与研究者的无意识偏见有关,它是否是研究者个人经验的投射,是否是研究者受传记作家叙事的影响和暗示的结果,还是代表了传主真实的生命问题。

在资料的选择和分析中,《天命可违》作者指出,需进入传主的生命故事与文献中,进入心理学的理论解释中,反复出入,以实现传主生命事件的顿悟和解释。这与现象学-解释学分析方法相一致。在《天命可违》中,作者提出关于诸葛亮生平的两大悬念问题,即择主和北伐。认为诸葛亮选择刘备和五次北伐的原因是不甚明朗的,需要进行深入解析。通常心理传记研究会将会将传主童年成长经历作为重要的资料进行分析。在《天命可违》中,作者选择了幼失怙恃、战乱之扰、青年忧愤、止得阿承丑女、生不逢时、三顾之恩来分析诸葛亮择主之谜。从诸葛亮出山后并未得到重用、刘备托孤、树立权威、写作出师表、借北伐僭越、刘禅眼中的相父几个角度来解析北伐。并通过诸葛亮内在心理动机的形成和作用机制阐释两大悬念问题。通过阅读和反复阅读所有收集到的相关故事档案文献而将自己沉浸于原始数据

中,以对传主的生活世界熟谙于心,包括历史和文化背景,能够让研究者的思维和意识自动地对材料进行加工,有助于让数据自己呈现出规律来,从众多材料中提炼主题。

在解释理论的选择与发展方面,如何解疑传主的生命悬念性问题和各种已收集到的生命故事呢?《天命可违》一书的作者认为可运用心理学的现有理论,也可进行自主分析和理论构建。通过现象性沉浸所把握到的传主生命故事的主题和线索,可以选择合适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这种关联性有赖于研究者对已有心理学理论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传主生命故事的洞见。当然,现有理论很难完全符合个体的生活实际,因为理论是一种抽象,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归类、解释的作用,但却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根据传主的生命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理论。《天命可违》一书中,作者通过马斯洛的动机理论、马勒的心理分化理论以及荣格的个体情结理论分析了诸葛亮的童年经历及其人格,并在已有动机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追求确定-不确定”的平衡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趋向稳定还是追求冒险取决于其早年经历,人的一生中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追求是平衡的。追求确定性是获得心理安全感的基本途径。安全感是推动个体决策及行为的内在动力,指个体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可以认识、预料、掌控,有组织、有秩序、有规律的世界中。幼年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个体,成年后可能形成对安全感的神经质追求,一个神经活动强的个体会选择通过自己超凡的毅力、努力、能力获得成就,以实现局势的控制感,从而重建安全感。作者认为幼年缺乏安全感及追求确定性是诸葛亮一生经历特别是择主和北伐的深层次心理驱力(舒跃育,2018)。

《天命可违》一书是将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应用于心理传记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说明。该书从传主的悬念性问题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将传主的生命故事加以整理,从整体上洞见传主生命故事的内在心理动因,体现了回归事物本身、化简为繁、注重整体性和内在经验的现象学研究属性,并以不同呈现方式探究和建构已有史料。研究者在分析被研究者时,也在不断发生自省,仿佛与被研究者共同经历了那些生命事件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也得到不断提升和清晰,这正是解释学所倡导的新型艺术观点,也是心理传记学的研究特色之一(周宁,刘将,2008)。

* 以下简称《天命可违》。

4 方法论视域中心理传记学的问题

作为一种现象学-解释学研究方法,心理传记学还处于探索阶段,在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心理领域,心理传记学仍面临一些质疑。

一方面,心理传记学的学科定位尚需明确。心理传记学在对人物生命历程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需要对其生命事件进行整理、组织、编排和解释,对人物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进行介绍和梳理,既涉及历史学,也兼具文学体裁的样式。那么,心理传记学究竟属于历史学、传记学,还是心理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依据心理传记学的研究目标而定。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是还原和解释历史事实,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走向。传记学的研究目标是记录和叙述人物生平,注重故事性、情节性、语言的文学性,虽然传记学也会涉及对人物生命事件的解释,但其不同于心理学。心理学取向的传记学也涉及对历史事实和人物生命故事的叙述和组织,但这些都是为解释和说明人物人格和心理特征形成的原因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心理传记学是以提出和解决心理学问题为研究目标的领域。因此,从根本而言它属于心理学范畴。早期大部分心理传记学是作为心理学理论推广和应用的一个途径,由文学家、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撰写,因此被看成是“临近学科消遣的工具”(舒跃育,2018)。《天命可违》的作者认为,心理传记学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是检验现有心理学理论正确与否,另一个是发现并提出新的心理学理论。但理论是为解释事实或现象提出的,提出理论并非终极目的,解释心理的、人格的形成原因才是。作为心理传记学开创者的弗洛伊德在撰写《达芬奇及其童年记忆》时,其主要目的是探究杰出的艺术创作能力是如何发展的。直到今天,心理学仍然要探究这一重要主题(Kasser,2017)。因此,不论心理传记学在当代如何拓展其研究视角,改变其研究方案,仍要坚持心理传记学是研究人格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实证主义研究。

另外,心理传记学作为个案研究其典范意义如何实现仍有争议(Elms,2007)。心理传记学在研究对象数量上属于个案研究,有时是以单一传主为对象的单一个案研究,有时则是以几个传主为对象的多重个案研究(辛自强,2017)。个案研究在稀有对象和个体差异较大的对象上,是群组研究的很好补充。但相关的争议围绕其代表性问题。舒华认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可通过对一个被试测试大量项目及推论统计检验,以达到由特殊到一般的效果(舒华,张亚旭,2008)。但心理传记学研究并不采用项

目测试,如何实现典型性呢?不同于基于大数据样本的量化研究,个案研究无法从广泛的人口学统计中进行概括,但是通过心理学理论与所选生活相关事件和经历的对话过程,心理传记学可进行一种“分析性概括”(Yin,2014)。不同于用样本平均数推论一个总体一般指标的群组研究,心理传记学充分挖掘和展现个体的生命属性,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适用于其他具有该特殊性个体的一般理论(Petalas et al.,2015)。群组研究通过共相将一般规律概括到个别事物,而个案研究则从一个殊相推广到另一个殊相(Mayer & Maree,2017)。《天命可违》中,作者详细阐述了诸葛亮的生平,并以“追求确定性动机”及“安全感和控制感”理论来解释一个拥有雄才韬略的人为何选择不具竞争优势的主公,这一理论同样可推广到类似的人格解释中。因此,即便是个案研究,心理传记学也在发挥一般性研究的作用。这一点与临床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中的个案研究是相同的。

最后,作为人文取向的心理传记学其科学性如何体现有待商榷。自现代心理学创立以来,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观察、实验、测量等自然科学方法上。这些科学化路径在定量、数理分析、控制协同因素等方面具有的优势是不可取代的。然而,这些研究方法也有忽略个体人格的整体性和特殊性等局限。人们质疑“人格研究中‘人’在哪里?”,特别是实验研究中,无法通过操控人格成长的影响因素,从而达到严格控制的目的和效果。心理传记学采用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关注整体人格,以同感的方式理解他人人格与人性,同时达到对他人人格形成过程的理解(倪梁康,2020)。同时,心理传记学致力于获得人格形成原因及机制的理论,是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案的有效补充(Kasser,2017)。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研究模式,心理传记学的科学性须遵循人文科学研究的规律和标准。在研究目的上,不同于自然科学追寻现象背后唯一确定的理性规律,人文科学旨在理解和描述人及其产物的多样性价值和意义。因此,除共时性比较及三角互证外,心理传记学的科学性还在于,其是否如实描述了研究对象,是否充分理解了对象的意义,是否能带来广泛的共鸣。这其中,如实地描述意味着要掌握大量丰富而可靠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反复推敲和整理,从而获得全面、深入的整体性认识。充分地理解意味着,调动自身的全部经验来解读对象,与研究对象实现对话,产生和构建新的意义,以使自身的存在得以展开。这种理解、构建和展开的过程其真理性将通过是否引发他人的广泛共鸣来体现。

参考文献

- 邓晓芒. (1990). 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方法的启示. *学术月刊*, (2), 6-10.
- 郭本禹, 崔光辉. (2008). 论解释现象学心理学. *心理研究*, 1(1), 14-19.
- 蒋平. (2011). 哲学解释学方法探析: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解读. *广西社会科学*, (11), 42-45.
- 李健国. (1995). 让事物自己表现自己的经验方式: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 (5), 80-85.
- 倪梁康. (2009). 现象学的方法特征:关于现象学与人类学、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思考.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3(3), 1-7.
- 倪梁康. (2020). 何谓本质直观:意识现象学方法谈之一. *学术研究*, (7), 7-14.
- 舒尔茨. (2011). *心理传记学手册* (郑剑虹 等译, pp. 24-26).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舒华, 张亚旭. (2008). *心理学研究方法* (p. 425).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舒跃育. (2018). 天命可违:诸葛亮行为决策的心理传记学分析 (p. 43, pp. 92-101, p. 41).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辛自强. (2017). *心理学研究方法* (p. 248).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周宁, 刘将. (2008). 心理传记学:概念、方法及意义. *教育学术月刊*, (4), 16-17.
- Elms, A. C. (2007). Psychobiography and case study methods. In R. W. Robbins, R. Fraley, & R. F. Krueger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p. 97-11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asser, T. (2017). Integrating psychobiography's mainstream: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72(5), 430-433.
- Knight, Z. G. (2019). The case for the psychobiography as a phenomenological-hermeneutic case study: A new phenomenological-hermeneutic method of analysis for life-narrative investigations. In C. Mayer & Z. Kövály (Eds.), *New trends in psychobiography* (pp. 133-153).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 Kövály, Z. (2011). Psychobiography as a method. The revival of studying lives: New perspectives in personality and creativity research.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7(4), 739-777.
- Mayer, C., & Kövály, Z. (Eds.). (2019). *New Trends in Psychobiography*.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 Mayer, C. H., & Maree, D. (2017). A psychobiographical study of intuition in a writer's life: Paulo Coelho revisited.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3), 472-490.
- Petalas, M. A., Hastings, R. P., Nash, S., & Duff, S. (2015). Typicality and subtle difference in sibling relationships: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s with autism.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1), 38-49.
- Smith, J. A., & Osborn, M. (2003).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 J. A. Smith (Eds.),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 Smith, J. A., & Osborn, M. (2015).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s a useful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on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ain. *British Journal of Pain*, 9(1), 41-42.
- Yin, R. K. (201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sychobiography: Phenomenological – Hermeneutic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A Review About the Book of “Destiny Can Be Violated:

Psychobiography Analysis of ZHUCE – Liang's Behavioral Decision”

Li Lili^{1,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2. The Key Laboratory of Xinjiang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 Urumqi 830017)

Abstract: Psychobiography uses phenomenological and hermeneutic methods to deal with the narrative data of individual life, and proposes and solv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y reconstructing and explaining the life course of characters. It is a phenomenological hermeneutic analysis method of personality research. This method emphasizes the phenomenological value of individual and special things, which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case study, it emphasizes that the researcher's consciousness experience has a di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bject, so as to take care of the complete personality and people's inner world. Fundamentally speaking, psychobiography belongs to the humanities research program of psychology. The book “Destiny Can Be Violated” fully embodies the research model of psychological biography, and is a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and hermeneutic analysis methods. In addition to synchronic comparison and triangle mutual verification, the scientific of psychobiography lies in whether it truly describes the research object, whether it fully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the object, and whether it can bring broad resonance.

Key words: psychobiography; phenomenological – hermeneutic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sciences